

1316.2
亚非译丛(2)

日本的大学

〔日本〕 永井道雄 著

张俊彦 译 卞立强 校

12
55
98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本书作者永井道雄，1923年生，1944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1952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等校任教，并曾任日本内阁的文部大臣。本人的专业是教育社会学。著有：《考试地狱》、《新教育论》、《文部省与日教组》、《大学的可能性》、《近代化与教育》、《福泽谕吉》等书。《日本的大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大学的历史与现状，与外国大学相比较，分析了其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造的建议，是一本介绍日本的大学教育的专著，曾获日本“每日出版文化奖”。这本书自1965年出版以来，到1979年已发行到第30版。现特全文译出，以饷读者。为便于我国读者，书中所用的日本年号一律改为公元。本书的翻译是北大亚非研究所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从事战后日本教育研究的工作项目之一，在此并向国际交流基金致谢。

目 录

序 言

一、大学的现状·····	(3)
繁荣中的危机·····	(3)
工业化社会的大学·····	(5)
日本的大学——它的特点·····	(9)
二、大学的历史·····	(17)
创立时期(明治——大正初期)·····	(17)
大学的变化·····	(29)
三、大学的作用·····	(42)
研究——从模仿到创造·····	(42)
专业教育·····	(56)
教养——人的培养·····	(70)
四、重建之路·····	(91)
问题之所在·····	(91)
自治和计划·····	(96)
重建大学的建议 ·····	(101)
参考文献 ·····	(108)
大学大事年表 ·····	(114)
附录图表 ·····	(121)

日 本 的 大 学

——产业社会提出的任务

序 言

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大学中工作的人，最近几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大学的现状果能长此下去吗！教育的内容并不充实；大学和大学生的数量虽然很多，却缺乏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人事方面的学阀主义、研究教育计划的不足等等，明显的缺点真是太多了。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我有幸能获得去美国、欧洲、苏联等地旅行的机会，参观了外国的大学。我还曾经作为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学习过，后来又有机会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系统的香港大学教过书。与在此期间所见所闻、亲身体验到的外国大学相比，日本的大学现状是非常糟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根据事实来弄清楚这一问题。

可是，一旦着手于这一工作，就不由得不深深地感到它的艰巨。简单地称之为日本的大学，其实它为数众多，内容庞杂。就拿一个大学来说，它便有研究、专业教育、教养教育等不同的职能，以及教师与学生的生活、管理问题等许多方面。提出这些实际问题，而且要作为一个总体来加以把握，并通过同外国的比较来弄清楚日本的大学的性质，这是很不容易的。

从事这样的工作，我是力不胜任的。不过，明知有许多缺点，却还想作为一个尝试来写这本题为《日本的大学》的小册子。这是

因为想把它当作一块引玉之砖，希望它能对打破现状起一点作用。因此，我在本书中就不单纯是搜集一些事实，而是一方面根据历史的观点，另一方面根据与外国相比较的观点，力求弄清楚其总体的性质。

这本书是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点一滴地写成的，比预定的时间拖长了。幸好在这段期间里，大学问题占去了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我在自己工作的东京工大担当管理委员，这个职务相当于其它大学的评议员，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要考虑大学的全局问题。而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在《朝日杂志》上连载的《大学之园》的执笔工作。这一工作对于开扩见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想我所写的还会有所偏颇，重要的事实也可能有写得不够的地方，希能得到读者指正。与此同时，我还想再一次强调重建大学这一当务之急。

最后，对协助本书写成的各位先生，特别对东京工大的同事和埼玉大学的山村贤明先生表示感谢。

1965 年 2 月

一、大学的现状

繁荣中的危机

日本的大学究竟是繁荣，还是面临着危机呢！？

仅从大学和学生的统计数字这一表面现象来看，日本的大学分明是繁荣的。据1969年度的《文部统计快报》，四年制大学的数目是379所，其学生数为1,355,000人，再加上473所短期大学及其学生263,000人，大学总数达852所，学生人数达1,618,000人。仅次于美国的2,183校、学生数552万人(1965年)，苏联的1,600校、学生数386万人(1965年)，而居于世界的第三位。所以仅就数字方面来说，日本的大学的繁荣，可以夸耀于世界(参看书末的《附录图表》)。

然而，日本的大学起码是正面临着在日本的大学史上最深刻的危机。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且让我们来提一个大学的最基本的而又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一下子可能回答不出来；好不容易回答出来，也会是五花八门而杂乱无章。

有的人会说，总而言之，大学的使命就是“探索真理”。但是，成百万的青年男女果真是在埋头于真理的探索吗？于是下一个人认为，大学是致力于“培养专家”的机构。不，更广义地说，我认为它是“薪金阶层的职业介绍所”。然而第三个人却说，大学的任务并不止这些，战后的大学把教养课程规定为必修，可见大学应是进行“教养”、促进“人的形成”的组织。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一下“什么是大学”这一问题。今

天的大学是战后才开始建立的新制大学。那末，什么是新制大学呢？虽然可以消极地把它规定为“不同于旧制大学”的大学。但这未必能说明其积极的意义。且不说新制大学这一普遍的问题，让我们就我正在教的、你正在学的（或者过去学过的）某一特定的大学来具体地考虑一下。

每天到大学去是为了什么呢？我和你在大学里专心致志于什么呢？

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很不明确，总的来说是混乱的。大学已不是教师和学生聚集在那里共同生活的学园。多数学生满足于在大学里有个学籍，而教师把大学当作讲习所的也不少。仅就数量来说，大学是繁荣的。但这种外表的繁荣却是一个陷阱。在这个陷阱里等待着的是大学的危机和衰落。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并不是仅限于日本吧——读者中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问。可是在我看来，这乃是今天的日本所特有的现象。理想信念上欠明确，因而现实中就显得不充实——这就是日本的现状。

试看一下私立大学的财政状况，在1963年度的总经费874亿日元中，纯粹作为研究费的只有80亿日元，仅为总数的9%。另外，从私立大学教师的人数来看，国立大学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8，私立大学则为1:29。因此，教师由于经费预算方面的限制，在时间方面也为教学而疲于奔命，不可能进行切实的研究工作。而且，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但在1969年度招生时，私立大学的招生额公布的是148,780人，而实际上录取人数是256,977人，入学人数全国平均实际上膨胀了1.7倍；如果学生全部出席上课的话，教室便无法容纳。这在许多大学中已经习以为常了。

现在国立、公立大学教师的待遇比私立大学要好，研究费也多得多。但这只是就日本国内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并不意味着国

立、公立大学已处于使人安心的状况。我在访问欧美的大学时，再一次深切感到，大学对欧美学者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工作岗位”。而日本的情况，正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就连国立大学的66%的教授、53%的副教授都在其所属的大学以外兼任职务。兼职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服部英太郎编：《科学家的生活和意见》）。

这种情况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然而，所以要兼职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待遇，一个是研究经费不足。现在理工科大学的青年研究人员大量转到企业所属的研究所或流到国外的大学。从这些事实中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了。特别是在日本的学术水平高相对来说语言上的障碍较少的数学家当中，外流的倾向更为严重。据《科学技术白皮书》（1968年版）所说，已经移居美国的日本科学技术工作者中，技术专家达67人、科学家48人、医生43人。

日本的国立大学教师们决不是不爱国的，也不是不安心于工作。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能够不为不安定的生活所困扰而潜心于教学和研究，不仅是他们的心愿，而且是他们的乐趣所在。但是，这在今天的日本是办不到的，研究经费也不够——这就是同私立相比而被称为理想之国的国立大学的实际情况。

教师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学生能够得到他们的教导，这是建立大学的最起码的条件。在今天的日本，却连这样最起码的条件也无法满足。由此看来，如果从世界的标准来考虑，有着旧制历史的国立大学与新制大学之间，以及国立、公立、私立之间，就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暴。大学正处于混乱之中，而加强与充实的措施却很迟缓，而且还欠缺根据长期规划来负责进行重建工作的主体。这是日本的所有的大学所共同存在的问题。

工业化社会的大学

日本的大学的现状是严重的，而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无疑主要是随着大学的扩大而产生的混乱。那么，靠重新缩小大学的

规模，回到旧日的状态，就能解决问题吗？——习惯于过去大学形象的人们也许认为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大学规模的扩大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在大学的扩大方面，美国远比日本为早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不过，并不只是美国有这种变化。在苏联和欧洲，随着社会的工业化，最近数十年来，大学一直朝着扩大的路子发展。随着扩大而产生的混乱，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混乱往往导致大学形象的丧失。美国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塞尔用“由于部分地包容了社会而不得不受到制约”(Limitation by partial incorporation)这一巧妙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今天大学的特点。这就是说，大学已被卷入了社会的工业化的宏大的进程；由于与社会接近，大学已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带上了新的脚镣。

然而，尽管混乱是严重的，如果有意识地把握它，有计划地考虑大学的重建，就可以打开一条生路。在欧洲、美国以及苏联，大学都在一边继承过去的宝贵的遗产，一边还在继续前进。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正在走有计划地重新改组的道路。

日本的情况与此相反，甚至连大学的混乱，也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更没有认真负责的长期计划。大学是在许多学者和学生受到牺牲的基础上，一味地走扩大的道路的，而把混乱置之脑后。日本的现状的危机主要不在于混乱本身，而是由于对混乱缺乏正确的历史的认识，以及在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并实行切实的计划。

英国的教育学家A·H·哈什把这种混乱归因于大学的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剧烈变化。据哈什的意见，西方从中世纪起到现在，大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A·H·哈什编、清水等译：《经济发展与教育》)。

第一个时期是从西方的中世纪起到产业革命。世界闻名的欧洲的具有历史传统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

的海德尔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这个时期的大学是名符其实的超脱世俗的象牙之塔，是少数知识精华为真理而探究真理的场所。但当经过产业革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时，大学也不可能例外，从为真理而探究真理，逐渐转向重视实用之学——技术，大学成了专业性的职业教育的场所。这个变化在美国比在欧洲采取了更尖锐的形式。

大学就这样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它的实质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哈什认为，大学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马上发生急剧的转变和混乱。写了这一时期的有代表性的论著《大学论》的马克斯·维伯也认为，这一时期继承了第一期的传统，保持了为真理而探究真理的所谓自治组织的基本原则。不过，哈什着重强调的是，与进入 20 世纪以来所谓技术革新的第三个时期相适应的、令人瞠目而视的大学面貌的急剧变化。

在世界的各工业国中，大学的规模已经飞跃地扩大了。工科在产业革命时期以前甚至并没有包括在大学之中，现在竟成了大学的主流；包括理科在内的所谓理工科学生大约占了学生的半数。另一方面，文科的学生已不是少数的知识精华，而成了白领阶级的预备军。大学的大门已向女性开放，大学一方面进行职业教育，同时又是学习一般教养的国民教育机构。

由此看来，随着扩大而产生的混乱，以及因接近社会而引起的大学形象的丧失，乃是世界上工业国家的共同现象。不过，混乱所引起的危机的深度并不一样。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那些赶超欧洲的国家，大学所发生的变化反而比欧洲更为迅速，随之而产生的混乱也更严重。

不消说，美国和苏联是“非欧洲世界”的领袖，同时也是 20 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也许听起来有点突然，就大学扩大之迅速，及其适应社会的工业化而言，日本的大学的发展，与其说同欧洲相近，毋宁说同这两个国家更为相似。在了解日本的大学的历史

与现状、探索重建的道路时，有必要特别注意日本的大学中这种“非欧洲性”的优点和缺点。

从有关大学的统计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学生适龄人口中，日本的大学入学率为16.6%，就是说每100人中有16.6人在大学学习。超过这个比率的只有美国，为39.3%。所谓欧洲的先进国，都比这个比率低，最高的法国是15.2%，英国是9.8%，西德不过是7.2%(参看书末的《附录图表》)。

让我们再举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史上的事实。截至19世纪末为止，即进入哈什所说的产业革命后的大学的第二期以后，欧洲仍未把工科包括进综合大学之中。原因是大学被认为是为真理而探究真理——换句话说，即探究神学、人文科学、数学、理学等“非实用”的学术的场所；而工学等所谓应用之学，则被认为没有在大学中进行研究、教育的价值。

但是，在美国，从19世纪前半叶开始，已有若干所大学把工学院列为综合大学的一部分。日本继美国之后，在1886年把工科大学校并入根据《帝国大学令》而创立的东京帝国大学之中。据A·G·科罗尔的宝贵的研究《苏联的科学技术教育》所说，苏联自1917年的革命以来，一直把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视为样板。因此，今天苏联的大学的研究至少在宇宙开发这一领域里已凌驾于美国之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日本的大学的急剧的扩大，比美国和苏联要晚得多。不过，在大学的大规模化、大众化、实用化方面，这三个国家都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其原因恐怕应当这样来认识：凡在世界史上工业化的竞争舞台上出场较晚的国家，尽管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西方与东方的区别，但它们都想采取比先行的国家更为彻底的方法来赶超先行国。换句话说，就是要实行更为彻底的机会均等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的才能。也就是基于产业和大学相结合的考虑，把大学的聪明才智提供给实用。这三个国家都有意无意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但是，在成功的背面却必然有“阿基里斯腱”^①。“非欧洲”各国是后起之秀，具有飞跃的能量。正因为这样，这些国家的大学所经历的第一、第二期的时间短，历史的根基浅而弱。其结果就是大学和社会的结合很紧。因此就必须看到大学被社会所俘虏的危险性很大。

在这三国中，同欧洲一样确立了独立的象牙之塔的传统，只有美国——主要是靠近东海岸的地区。就是在美国，以1862年参议员莫里尔所提议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为基础而建立的各州的州立大学，也完全是从作为实业大学出发，其目的在于改善农业和机械工业。由于革命而试图与历史一刀两断的苏联，以及由于维新而谋求国运发展的日本，都是一开始就带有很浓厚的在国家领导下的“国家的大学”的色彩。

因此，在获得飞速发展的这三个国家中，大学的数量众多，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作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的形象产生了混乱。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恐怕是随着令人惊异的飞跃发展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日本的大学——它的特点

无论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同欧洲各国相比，它们的大学的扩展都很迅速，因此而产生的混乱也很严重。

但是，从对待这种混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重建大学的能力和计划性来看，遗憾的是，日本要比美、苏两国落后得简直无法相比。要重建日本的大学，按照欧洲那样的速度和计划性是赶不上的，必须要有能够同美国的所谓新大陆的进取精神以及革命后苏联蕴藏的干劲相匹敌的劲头。

美国的情况与欧洲相近。特别是它的东部沿岸的那些老牌

①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出生后被他母亲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因此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阿基里斯腱”即指致命的弱点。——译者

的大学，它们是依靠着比欧洲的大学更强烈的独立精神的清教徒们的热忱建立起来的。

例如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它附属有比英国的古典大学有过之无不及的寄宿制的专门学院，教授在同学生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绅士教育。而且，无论是耶鲁、哈佛或哥伦比亚，大学都不是由国家——换言之即由政治——所规划和创立的。这些大学是由少数同仁私人结合，揭橥固有的理想，与政治、经济毫不相干，完全在独立的设想下建立起来的。

不仅如此，在一向以资源丰富、资本主义经济兴旺而自豪的美国，大学通常是以私立学校为主流，但其经营之稳定，是日本所无法想象的。每当出现了卓越的领导人，其稳定的经营总是与传统的独立精神相结合；他们虽然也适应时代的潮流，但总是不断地开展加强基础的研究和教养的试验。

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929年，占有在美国被认为是第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席位的，是年龄不满30岁的罗伯特·哈金斯。哈金斯的年轻确实震惊了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理事会决心选择如此年轻的哈金斯来担任大学校长的重要职务，主要并不是看中哈金斯本人的才能，而是期待着年轻的校长来改革大学。

当时美国的大学是繁荣的。大学和大学生的数字一直与年俱增。但是，在理事会和哈金斯的眼中，大学正在堕落。能够雄辩地说明哈金斯的想法之正确的，就是他就任校长以后所作出的显著的成绩。

在美国的大学中，足球比赛盛行，特别是一到秋季，大学一直处于比赛的热潮之中，学生们根本不顾学业。学生进行体育活动是必要的，但对比赛的过分热中就违背了大学的本分——抱着这样想法的哈金斯，封闭了芝加哥大学的足球部，关闭了壮丽的足球比赛场的大门，钉上钉子，禁止入内。

当时社会正在追赶着技术革新的浪潮，迅速地工业化。许多

大学也在社会变化的影响下，强调搞立竿见影的研究和合乎实用的教育。但是哈金斯却认为，如果大学只重视实用，大学就成了社会的俘虏，就会毁坏创造性的研究、发明和发现的根基。

基于上述观点，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教育，选定出西方主要的古典作品，要求学生研读。当时的美国大学一般都向大众开放门户，进行老一套的教养课程。他顶住了这种倾向，致力于用难读的典籍来培养有个性的英才。有才能的人可以跳级。结果，十几岁便在大学毕业，二十来岁便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不断地涌现。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与教学迅速地充实了。在哈金斯就任校长以后，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才辈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哈金斯的大学改革给美国的教育界带来了刺激。对大学问题的探讨突然盛行起来了，阿姆斯特大学、圣·琼斯大学等许多大学都着手进行改革。哈金斯所批评的大学的实用化、世俗化，虽然在美国的大学中以后仍在发展，但在大学的繁荣所产生的混乱中，哈金斯的警告的意义是重大的。今天美国大学的一般趋势仍是大众化和实用化，但在继承基础的研究和教养这一大学的珍贵遗产上，日本固不必说，连欧洲也是瞠乎其后的，这应当说是得力于以哈金斯为首的先觉者们的认真的改革。

苏联的大学缺乏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从苏联教育的研究来看，连苏联学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例如，1956年塔甘罗格无线电技术研究所所长夏巴什尼柯夫就认为苏联的大学政策太过于中央集权了，他说：今后“各个组织应有制定讲义大纲的权力，政府的作用最好只限于促进众多组织相互之间进行经验交流。”（科罗尔：前引书）

不过，另一方面，自革命以来，苏联政府一直以认真负责的计划性致力于大学的充实，这是众所周知的。正象美国是以欧洲为奋斗目标一样，革命后的苏联是以美国为赶超的对象。其结果，在革命后45年的1962年，在世界上的工业先进国中，理工科学生

的人数超过学生人数 50% 的，只有苏联的 56% 和英国的 52%。超过了西德、法国的 42%，大大凌驾于美国的 29% 和日本的 26% 之上。这个数字可以看作是国家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教育上所投入的力量的结果。

日本的大学，在其核心是国家的大学这点上，和苏联相类似。但从缺乏彻底的计划性这方面来说，则比苏联差。另一方面，日本在拥有为数众多的私立大学这点上，与美国相类似。但从缺乏稳定的经营和传统的独立精神这方面来说，却又是似是而非的。换句话说，日本的大学，无论官学也罢，私学也罢，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它们本来应有的优点。国立的缺乏计划性，私立的缺乏独立性，这就是今天日本大学的现状。

不过，日本的大学也并不是从创立时期起就围着社会的变化转的。创立时期的大学，无论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并不随着社会转，而是具有展望未来、走在社会前头的气概和计划性。其所以未能保持到现在，乃是因为碰到了历史的急剧变化时，就全力以赴地去追上时代潮流的缘故。

按照哈什的大学发展的理论来看，日本的大学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即创立期，是从 1886 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创立到大正初期。这一时期相继在京都、东北设立了帝国大学；另一方面，也打下了私立大学前身的私立专门学校的基础。

第二期是从大正初期起——特别是从 1918 年公布《大学令》，早稻田、庆应、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国学院、同志社等许多私立大学同时得到正式承认；另一方面，又新建立了一些国立、公立的大学，大学的规模飞跃地扩大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第三期不消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创立了新制大学制度，国立的地方大学、巨型的私立大学、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都相继诞生了，这些是我们记忆犹新的。

我在追溯日本的大学的发展历史时发现：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发展是不连贯的，是中断了的。例如，就国立大学来看，在第三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大学的数量确实急剧地增加了，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却完全缺乏象明治创立时期那样的认真负责的领导人。在明治创立时期有着象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那样的领导人，他周密地设计了日本的国立教育体制，并果断地付诸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大学采用了新制度。它不是把国家的领导，而是把进一步加强自治当作原则。这样做也无不可，但政府必须要承认这个原则；同时，大学也必须根据自治的原则，具有周密的计划性。然而，自新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遗留下来有待解决。

可是不幸的是，就私立大学的历史来看，其传统的中断比国立大学更为严重。私立大学创立时期的领袖，如庆应的福泽谕吉、早稻田的大隈重信、同志社的新岛襄，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见识和独立的精神，跟世界上任何私立大学的领导人相比，丝毫不逊色。当时这些私立大学干劲十足，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但是，居于日本的大学的核心地位的毕竟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终究是处于陪衬的地位。在明治的大学创立时期，私立学校在法律上都只能算作专门学校，其财政基础贫弱，根本无法同欧美相比。

私立学校的建校传统明显的突然中断，是在1918年根据《大学令》升格为大学的时候。这简直是有点讽刺的味道。私立学校之所以升格为大学，并不是因为它的经营或学术的基础已经巩固，也不是由于政府为扩展大学而决心给予有计划的财政援助。私立学校升格为大学，谋求其扩展，只不过是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需要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的薪金阶层罢了。

从此以后，除去少数例外，私立学校生动活泼的建校精神就中断了。升格为大学以后的私立学校，一味地追随社会的变化，

一方面经营不断地出现赤字，又一而再地扩大又扩大。从大正时期到昭和初期，许多私立学校变成了大批的薪金阶层的职业养成所。在第三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趋势更为严重，旧的私立大学巨型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女子大学、短期大学。私立大学变成了与其建校精神毫不相干的巨大的教育企业。

我可能是把日本的大学的特点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国家的大学的帝国大学，也并非一味地听命于政府的领导和控制，无计划地不断扩大。应当高度评价一些先辈们为确立大学的权威所作的努力，如大正时期京都帝国大学的泽柳事件^①、东京帝国大学的森户事件^②、昭和时期京大的泷川事件^③等。也不应忘记许多学者为加强基础研究和充实大学的教育而作的努力。一些处于逆境中的私立学校的领导人，一方面顺应时代的潮流，同时又为发扬建校的精神而反复地进行了宝贵的试验，这也是应当铭记的。

尽管如此，但同各国相比，在大学发展的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的日本的大学，缺乏走在社会前头的计划性，急于追随社会的变化。这个事实大概是不容否认的。日本的大学的性质已不是超然地追求真理，穷究知识，从而为长远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而是变得越来越廉价地迎合社会的实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学热”中，这种趋势令人有已定型化之感。大学虽然在不断地增设，政府固不必说，就连大学的当局也没有积极主动地提出打破现状的计划。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在于它的作用发生了混乱。今日的大学的功能已不象过去那样单纯。过去人们说大学是为真理而探究真理的“象牙之塔”。但是，今天就大学的任务而论，除了：(1)学术的研究与教育的传统机能之

①②③ 关于这三个事件的情况，请参看本书第二章“大学的历史”、第二节“大学的变化”。——译者